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五四期 ——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3 b)

【往事如烟】文革杂忆	阳 溯
【史海钩沉】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张 化
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卜伟华
追寻历史真相	叶永烈
【研究评论】文革七问	卢周来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 【往事如烟】

文革杂忆

• 阳 溯 •

◇ 我所经历的文革是这样开始的：

1966年初夏的某天，我照平常一样从马神庙1号骑车到高教部上班，刚进大院就看见一堆人，围着看贴在办公大楼后墙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揪出彭真黑帮蒋南翔，署名赵秀山、肖克杰，这张大字报揭开了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赵、肖是什么人？一个是办公厅副主任，一个是机关党委副书记，可谓都是司令部里的人。他们造反打头阵是什么原因？教育部第二张有名的大字报是卢正义贴的，卢是某司的副司长，平时病休的时候多，为什么这时候跳出来？人们心里在想。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有房子墙上贴满了，就在院子里搭满了大字报棚架。我们保蒋批赵、肖的就是保守派，原教育部（教育部和高教部曾经是分开的——编注）那边保何伟的也是保守派，一煞时形成了四大组织两大派，互相进行大字报战，这保守派的帽子谁也不原意戴，都说自己是革命派，走马灯似地今天打倒刘少奇，明天打倒陶铸，我们这一派叫北京公社，与北大聂元梓联络，属于天派，与以北师大谭厚兰为首的地派，互相天地派不停地斗，现在看来，都受中央文革的操纵和利用。文革一开始司以上领导干部除赵、肖之类的造反派以外，大都被打成黑帮、走资

派，轻则扫院子，重则戴高帽批斗，有一次看见高沂副部长罚跪在台阶上，因为他是国民党警察出身。处以下的干部都是群众，可笑的是大街上经常可见这样的大标语：“打倒\*\*科的最大走资派”“打倒\*\*仓库的走资派”，可见“发动”群众之深入及广泛。

#### ◇ 天派地派教育部夺权，一场我唯一经历的“武斗”

1966年7月间，由于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了造反派夺权风，各部门都有两派，都要夺权抢大印，势力小的就借助外力，引兵入关，教育部的延安和革联就招来北师大的学生，一律带着红卫兵袖章，进占大院，把住大门不让进出，我们这一派那天夜里二十几个人挤在肖琳、荣健住的小屋内，大约11点多钟，我和刘俊江（刘文革后调中组部，任国外干部司的司长，权力很大，派驻外大使都要经过他）从小窗户爬出去，一直步行到北大找聂元梓的二把手，北大派学生也进驻大院，发生了一场冲突，不过没有打伤什么人，只是把食堂给砸了，搞得几天开不了伙。其他的“武斗”大都是部内两派，推推搡搡而已。

北京两派武斗最出名的要算七机部的915和916了，外地的武斗听说要厉害得多，不仅是棍棒等冷兵器，还真动了枪炮，这些都有部队介入，“文化”革命演变成了“武化”革命。

#### ◇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

也可以说是，因为有很多人的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仅举一、二例：有一位副司长一开始紧跟赵、肖贴大字报造蒋南翔的反，待一反攻，第二天就跑到蒋那里跪下来，痛哭流涕地说“南翔同志，我错了”，这种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的人，心里装满了“私”字，一切为的是“官”字。下面一个例子，那是我的老乡宗祖云，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是蒋南翔的秘书，赵、肖的大字报一贴出来，他就站出来揭发蒋，他站在一个高台阶上，大声地滔滔不绝地在讲，那时候我不认识他，站在人群中听，有人在旁边说：蒋南翔的秘书。大家以为他有重要的材料揭出来，其实是些公开的讲话及来往批文等东西。往后他就成了造反派延安公社的骨干，后来他又反水。我与他相遇是在文革的后期，我们一同被遣散到青海西宁，同住在招待所里半年多，他分到省教育局，我分到青海工农学院，待到74年以后各找门路纷纷回京，他对我说：我们没有脸面去找老同志了。他对文革初期表现的后悔，我怀有充份的同情。

#### ◇ 卢正义失踪之谜

前面提到的教育部贴第二张造反大字报的人卢正义，江苏南通人，当时任中学司副司长，在文革初期很活跃，我看到一个灰白头发的矮个小老头儿，约摸五十来岁，在院子里与人辩论，是教育部文革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待到红卫兵公布六十多人的叛徒名单，全国兴起抓叛徒的高潮，我们这一派就枪打出头鸟，从干部档案中了解到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到各地调查他的材料，其中主要是在江苏反省院的档案中，查到一份卢的自白书，把它公之于众要揪斗他，卢在部内藏身不得，就由本派两名青年保护逃往外地，就像侦探小说一样，这一派就派人跟踪追逐，这样在外藏匿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我们跟踪的人在南京轮船码头看到他的身影，知道他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无法追上他。就在这艘船上，第二天一早护送他的人发现卢不见了，从此卢正义失踪。据护送他的两位青年回忆说，当晚卢的情绪尚好，无要自杀迹象，那么人到那里去了？至今是个不解之谜。据一份材料讲，卢被捕以前，从上海逃出来是在张春桥家里过的夜，卢与张有较密切的关系，张春桥是否有类似的历史问题，怕牵连出来而采取灭口的办法，这仅是文革以后的一种猜测而已。

#### ◇ 凤阳县监狱

高高的围墙，小小的窗户，屋里阴暗而潮湿，坐落在安徽凤阳县城东口的这个院落，原为凤阳县监狱，现在它是教育部五七干校的总部和转运站。凤阳就是花鼓戏里唱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解放前凤阳是以要饭出名，一到冬天全家锁起门出外，到江浙一带要饭，成为一种风气，不管家里有得吃没得吃。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些江北来的要饭佬。

林彪六号通令以后，各中央机关和大学纷纷下放干部到干校学军、学工和学农，并进行斗、批、改。教育部军管在县内各处山林、荒丘设立了九个连队，分别安置了部司局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一千几百人。

因我夫人单位二机部的干校在湖北，我们决定一起到凤阳干校，于69年11月先把两个女儿小蕾、小茵带回宜兴老家，由奶奶看管，然后趁火车到临淮关，再坐汽车到了凤阳，在那个监狱里住了十来天，才下连队。那时凤阳县城是一条街，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就十多分钟，大概朱元璋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吧？！记得我们寻访到了朱皇帝出家的皇觉寺，三面墙只剩了半面残壁，很小的正殿已没有香火，代替的是农民住家的炊烟。在县城的西北边朱元璋本想建一座皇宫，没有建成而停工，如今只剩半截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城墙，这墙是特制的大砖用糯米汁和石灰砌起来的，不管它有多坚实，讲求实际利益的农民会去拆皇帝老子的墙来盖自己的房。方圆数里的城墙内一堆堆乱砖上，长着随风摇曳的杂草，凭吊着一代草莽英雄。

#### ◇ 三连大石岗

凤阳地处江淮之间，多丘陵，土地贫瘠，那时农民劳动一天只得一、二角钱。我们连队的驻地叫大石岗，它确实是个荒芜的乱石岗。离得最近的村子叫许港，最近的市镇叫二十里铺，我们起初住在临时搭的大竹棚内，既是宿舍又是饭堂，开会大批判的会场。一百多口人共两个棚，一个住男一个住女，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冬天的风从芦苇缝中钻进来，冷嗖嗖地。头几个月伙食不好，主食发了霉的白薯干煮米饭很难吃。

我们连队由外事司、学生司、外语司、办公厅等人员组成，钱其琛夫妇就在这个连，我夫人和他在同一班，我和钱夫人同在炊事班，在这个连队的还有刘恺风副部长和高沂副部长。第一个冬天的任务，就是到大青山采石盖房子，结果房子硬是给这帮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盖起来了。春节左近我们居然住进了新房，和我住隔壁的是刘恺风和他的小脚老伴，那时他们就近七十了，刘为连队烧开水，经常听到他的喊声“打开水了”，他老伴杨老太为大伙缝补衣服。为了照顾我动过胃切除手术，把我分配在炊事班，管小卖部当出纳和帮忙洗菜、揉馒头，因此我学会了两个手一起揉两个馒头。每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跑来回十几里地到小镇上收发信件和取报纸，有时还到蚌埠去为食堂采购，高沂是赶大车的，往往我坐车，他在地里牵着骡子走，这时人和人不分级别高低强弱，都是平等的，烧开水赶大车的部长和做饭送报纸的办事员，都是五七干校学员。尽管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下雨天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快要没过深筒雨鞋，下雪天冰冻路滑，生活像这乡间小道一样艰难，可是心里却还平静和淡泊，因为没有名利地位、升官发财等思想的干扰。我往往路过二十里铺中学时想，文革结束后能在这里当一名中学物理教员，就心满意足了。

#### ◇ 向贫下中农学习

连队里的斗、批、改，都是由那个王军管领导着，因为教育部已宣布撤消，“

批”什么没有对象，“改”什么没有目标，“斗”主要是斗五一六分子，即清查和审查五一六嫌疑人，自揪出中央文革王、关、戚，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以后，五一六就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军管不管三七二十一两派的及幕后指使人都在清查和交代问题之列，我们这一派明明是保守派，抓这一派的头头及幕后指使人，比之对立的造反派更凶，导致我们北京公社头头孙适中在隔离审查期间，上吊自杀身亡。孙适中原担任过徐州市委秘书长，可在教育部是个科员，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在教育部文科司，我们都称他“大头科员”，前面说过在中央部委司局级以下都是革命群众，他站出来成了一派的群众头头，真是被军管冤屈死的。就我所知，除他而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柳在早期跳楼而亡。教育部在文革中死亡和失踪（前面提到的卢正义）共三人。

连队里的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开了三十多亩荒地，挖了一个塘。劳动之余在小油灯下看马列，有时也念念外语。每周一个晚上到附近村里贫下中农家走访，作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主要形式。我们常去的村就是许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全是茅草屋，村里唯一一家地主，住的也是茅屋。有一座小学也是茅屋，里边的课桌是泥巴堆起的，我小女儿就在这个昏暗的教室内上了一年级，每天上学除书包外都要背个小木凳，因为那教室里除土桌子及墙上一块抹黑的黑板外，别无他物。看了这些，我们作为教育部的干部，心里都愧疚难安。这倒是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 修正主义处理品

1971年秋，有一天把党员紧急招集到总部，开了两天学习班，传达和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众怒所谴，林彪成了替罪羊，广大党员舒了一口气，心想文化大革命总该结束了吧！接着批陈伯达、批林彪，离群众离本部门的事很远，两派都没有什么矛盾。接着进行了整党，叫“吐故纳新”，每个党员都要写一份检查，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认识不够的要继续检查，直到通过为止，叫做“爬坡”，爬过这道坡，恢复党籍。钱其琛和我夫人一个支部，钱夫人和我一个党小组，钱经过三次检查才通过，主要是在检查中暴露了这样的思想，他说自己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遗老、遗少，这就招来造反派没完没了的批判，爬了好几次坡，我夫人等为他说了几句开脱的话，说“老钱是自己暴露的思想，只是一种真实心情而已，自己说出来就说明有认识，不要再揪住不放”。钱夫人周寒琼当时也很消沉，谈心时说“老杨你们有专业，将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而我们就可能在大石岗一辈子了”，我也对她说了些宽慰的话。

过不多久这帮被军管视为修正主义处理品的“遗老、遗少”重新起用，处理品中不光是垃圾，还真有日后闪光的珠宝在内。

1971年底，钱其琛等十多人首批调外交部，先是驻苏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后新闻司司长、副部长、部长至副总理，钱头脑清晰，思维逻辑性强，说起话来扒着手指头，顺口而来有条有理。这十多人中大都后来当参赞、司长和大使，在外交战线起了很大作用。1972年春节过后，我们一批既不再需受审查又不审查别人的干部，被重新分配到边疆十个省，我和我夫人被分配到了青海，分配之前方案不与本人见面，一宣布就走人，真像处理品一样。尽管有几许委曲，尽管吃了些苦，尽管面对荒山野坡而非人间美景，但是对于校那种简朴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平等，留有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 □ 寄自美国

~~~~~

#### 【史海钩沉】

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 张 化 •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却是经中央全会通过的一场政治运动。在其发动阶段，引人注意的是，1966年的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会后一段时间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由刘少奇领导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五一六通知》中所称的“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恰恰是刘少奇！他就是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随着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的严厉批评，刘少奇开始认识到自己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从这时起，刘少奇对运动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也有了深刻体会。

第一、强烈感受到党中央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作为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是刘少奇屡次觉察到的问题。1966年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同意，并在专程去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却个人决定撤销并批判《二月提纲》。同样，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是却由他主持会议，通过事先确定的文件。如此等等，不会不在这位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的心中留下印象。通过《五一六通知》时，针对有的同志提出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做细微改动，却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的情况，刘少奇说了一段含义颇深的话：“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这些话虽是就文件本身而言，但刘少奇对党内“独断专行”现象的感受亦包含其中，对个人崇拜的无奈也流露其间。会议结束时，他直言：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38页）。这次会上，这位“糊涂的”的主持者，与不厌其详地介绍毛泽东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五一六通知》起草情况的康生、陈伯达等人形成了鲜明对照。此时，谁是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和会议的主持者已经不具实质意义。刘少奇似乎明白自己在领导核心中实际上所处的地位。

7月中旬，随着毛泽东回到北京，对派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各大专学校的工作组旋即被撤销。快速变化的形势又一次把刘少奇置于“糊涂的”境地。7月29日，在北京市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大会上，刘少奇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面对万名群众，这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坦陈“不晓得”，无异于是把他对党内生活的部份感受公之于众。这次会上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提出了“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问题”的建议。他说：在运动中要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7页）对于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口号，他说到运动后期再作结论，并认为，“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注：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这些话，既坦露心迹，又发人深思，他隐约感受到的矛盾、是非和难于言表的提醒、告诫尽含其中。在长期的斗争中，刘少奇曾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过重要贡献。以后，又在历次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包括对党内正在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加以某种肯定。现在，当他强烈感受到党中央民主生活不正常时，提出“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可以说是思想的重要转变。

第二，明白了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模糊感觉到的问题明朗化了。会议开始后，刘少奇报告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当讲到工作组问题时，毛泽东频频插话，多次打断刘少奇的发言，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在政治局常委

会已经不能平等讨论问题的情况下，刘少奇在8月4日中南组发言时，不得已给自己扣上了各种政治帽子，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等；但言辞中仍流露出他对党内生活的真切感受。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一个多月前，他还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对这场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面。（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8页；第641页）现在，意识到自己成了“上挤下压”的矛盾焦点，成了看“革”自己的“命”可不可能的对象，是刘少奇思想的一个变化。在同一天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并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面对毛泽东的指责，刘少奇再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回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8页。“五不怕”即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终于揭开了他自认为1962年以来存在于党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性质，也进一步揭开了刘少奇在一个长时间里感觉党中央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

还在两个多月前，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第三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以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注：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页）。现在，他却被明确地指责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人物，从这时起，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很快成为揭发批判的主要对象，在党内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当天，刘少奇从建工学院回来后，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注：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第76页。）这句“不配领导”标志着刘少奇思想的醒悟。这以后，刘少奇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检查自己犯了错误，他的回答有了变化。1966年10月，当工作人员问他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时，他说：“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他还说：我“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注：《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4页）。1967年7月4日，他再次作检查时说：“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7页）“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9页；第654页）这里，他似乎是在勾画一年前自己充当的可悲角色。他认为工作组错误的关键在于自己，自己虽然受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支持，造成了工作组犯“错误”。他对工作组“错误”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分析，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第三，顾全大局，承担责任，试图及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刘少奇努力去作的一件事情是，承担责任，试图把受自己牵连的大批干部解脱出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他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并保证：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来。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在批判大会上，刘少奇尽管受到种种无理对待，仍耐心回答群众的提问，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站在维护党和毛泽东的立场上（注：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

105页)。身处逆境，仍实践着自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倡的：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4页），是刘少奇在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越来越多。随着对刘少奇批判的不断升级，他逐渐认识到，这场运动不是严肃的党内斗争，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场悲剧。从此，他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奋起抗争，却难以改变悲惨的结局。

◇ 坚决反驳各种造谣诬蔑——1967年2月，刘少奇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诉说：“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怎么办？”（注：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111页）然而，刘少奇的被打倒已渐成定局。对于一些人在“革命”名义下对自己的造谣、诬蔑，刘少奇深恶痛绝。他愤慨地说：“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8页）他一次又一次地致信党中央、毛泽东，反驳强加给自己的各种罪名，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中央进行调查。1967年8月8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郑重声明：“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他再次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写明：“我已失去自由”（注：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但是这些声明和要求毫无回音。

◇ 用宪法捍卫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主席的尊严——刘少奇除了一次次地申诉、争辩以外，还寄希望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对社会混乱起到制止作用。他曾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劝阻子女跟着红卫兵组织去破“四旧”、抄家。当造反派“勒令”他写检查，对他进行批斗时，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注：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当“革命”狂潮席卷全国时，刘少奇试图以国家宪法来捍卫公民的人身权利，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虽然对阻止揪斗无济于事，却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警示世人的悲壮之举。

◇ 意识到“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平静地立下遗嘱——对刘少奇的批判声势越来越大，他及家人受到的人身侮辱不断增多。1967年4月9日，当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时，他胸中的激愤又一次爆发了。他告诉家人：“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 寄希望于历史和人民——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在刘少奇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过，特别是他先前对现实的希望都落空之后，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历史和人民。他对王光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以后，刘少奇失去了申辩的机会和条件，沉默成为他表示抗争的方式。这是曾经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均未见效后，唯一能采取的抗争形式。他满含冤屈，沉默无语，孤独一人，重病在床，仍恪守着自己的诺言：不自杀，不反党。

□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1月号。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

员。

∞ ∞ ∞ ∞ ∞ ∞ ∞ ∞ ∞ ∞ ∞

## 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 卜伟华 •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到1967年的7月和8月，“天下大乱”的局势已经发展到连毛泽东自己也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围困中南海事件”就是当时发生的一起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动乱。从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 ◇ 中南海边风暴骤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年1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先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于1月5日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1月6日将刘的信批转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7日凌晨3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周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毛泽东1967年初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时，仍认为刘少奇应选为中央委员，但在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3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这个报告3月21日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此后，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径也更加肆无忌惮。

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号称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此前，清华大学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华检查，都没有得到批准。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召开，明显地给造反派发出一个信号：中央对刘少奇的政策已经有了改变。

4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所谓安营扎寨，就是在马路边上竖起旗帜，搭起帐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传板报，造反派学生轮班在那里值守，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他们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示自己揪斗刘少奇的决心。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

他们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已屡见不鲜。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戚本禹等的支持下，北京出现了一大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



批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为防止意外，中南海不得不将两个西大门关闭。11月8日，周恩来在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时说：“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1967年1月初，到中南海来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造反派越来越多，据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中南海的）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1月8日凌晨，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将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 ◇ 刘少奇被迫作书面检查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6月14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7月4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他在这份检查中写道：“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这样一个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检查，不但没有丝毫缓和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方面的压力，反而被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戚本禹原来打算将刘少奇的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对立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八一战斗团”成立于1966年8月1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于1967年4月20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应该给他们写检查才对，因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7月9日，“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经中央文革小组建议，7月13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新八一战斗团”还组织了巡回报告队，到北京各单位去煽动“揪刘”。并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

长春等地，大办“揪刘”小报，在全国大造舆论。

◇ “中央文革”火上浇油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7月11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煽动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

7月13日晚和14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7月14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开周恩来，将这封信送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15万人，中学10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所谓“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7月15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想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对于“新八一”这种粗暴无理的要求，刘少奇实在忍无可忍。7月16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7月16、18、19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继续诬陷刘少奇，煽动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

7月17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7月18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

7月17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后，由戚本禹于18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并进行人身侮辱，让他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毛泽东在武汉闻讯后，对此事进行了批评。

7月18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100多个组织共1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

#### ◇ “揪刘火线”越搞越大

7月19日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汇成了人山人海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

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尤其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游行活动经常造成交通堵塞。7月21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大街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要揪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你们却不去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联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

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做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7月24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8月1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1000多个单位约30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8月5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7月26日凌晨，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你们要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刘少奇说他8月5日才知道犯了错误，这是要害问题，要结合他7月29日的讲话，对照着批，下功夫批……你们别急，水到渠成，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揪出。”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所谓的“揪刘火线”越搞越大，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7月底8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使整个长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然后传达两点指示：（1）南门不能设点；（2）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

#### ◇ “天派”“地派”余波难平

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期间，周恩来多次对造反派的过火行动提出批评，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毛泽东也没有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动，在“揪刘”问题上，他坚持了“背靠背”的原则。最后在他的干预下，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撤除“揪刘火线”的决定。

8月4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多个群众组织共73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8月5日凌晨在人大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中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

8月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同时，由中南海造反派对刘少奇再次进行批斗。围困中南海达一个多月的“揪刘”活动达到了高潮。

8月5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队伍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是“围困中南海事件”的余波了。

□ 原载《百年潮》1999年12月

∞ ∞ ∞ ∞ ∞ ∞ ∞ ∞ ∞ ∞

追寻历史真相

• 叶永烈 •

#### ◇ 采访陈伯达的曲折过程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如今出狱，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和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陈伯达当时已经85岁。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我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说，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十分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的采访“切入点”。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他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现有的档案或

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他终于同意了。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4小时也不觉疲倦。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7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7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 ◇ 采访王洪文贴身秘书

廖祖康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廖祖康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

在一个很难寻找的单位里，我找到了他。他希望能过平静的生活，所以他谢绝采访，不愿重提往事。

1976年10月6日，那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而他却是10月5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才9天，他奉命于10月14日飞往北京，一到那里便被送入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从此，与新婚之妻天各一方。然而，她一直等着他，等了那么些年，终于等到他恢复人身自由。他们这才有了一个小女儿。一家三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珍惜小家庭的安宁、幸福、团聚，所以他几乎不谈“文化大革命”。

廖祖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过18岁。我问廖祖康怎么会成为王洪文的贴身秘书，他很爽快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1966年夏天，他和上棉十七厂技校里的几个同学在黄浦江游泳，看到一艘轮船停在江中，他爬了上去，想歇个脚。不料，那是一艘外轮，穿着一条游泳裤衩的他被边防人员扣住。当时，王洪文前来处理，并未说他“偷渡国境”之类，保了他。从此，他打心底里感激王洪文。因为那件事一旦上了大字报，他就怎么也洗刷不清了。

后来，王洪文从北京串连回来，在厂门口受到围攻。廖祖康带着一批技校红卫兵把他救出重围。这样，王洪文看中了他。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首领，成天在“司令部”工作，很少回厂，也很少回到就在厂附近的家中。王洪文需要一个人跑跑腿，送送厂里的材料，送送家里的衣服，他选中了头脑灵活的廖祖康。

王洪文不断升迁，从“工总司”司令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一直跟随左右，做他的秘书。

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据廖祖康回忆，当时只说去京学习，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以为是短期出差。

最初，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学习”回上海去。后来，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理所当然安心了。

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于是，便发生了“长沙告状事件”。

“其实，王洪文去长沙两次。”廖祖康说道，“第一次是在1974年10月17日，那一次我没有跟他一起去。第二次是在12月。我和他一起飞往长沙。那一次的情况我了解……”

飞抵长沙后当天，毛泽东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廖祖康坐在外面，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双眉紧皱。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你不要搞‘四人帮’！”翌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要他写书面检讨。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蓬蓬蓬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廖祖康还说：“我以为，王洪文也有一个转变过程。他是慢慢地变过去的。一开始造反的时候，他也只以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张春桥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是被张春桥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能不受张春桥的控制，他进入‘四人帮’，有他不可避免的一面。当然，他犯了罪，主要还是他违背了毛主席关于不要搞‘四人帮’的多次警告……”

#### ◇ 胡乔木的“免斗牌”

关于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去看望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胡乔木夫人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了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4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因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校学习。

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停车”的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当毛泽东说去看看胡乔木，张耀祠才明白过来。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此时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然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准备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深夜12时，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 ◇ 拘捕江青的详情

我从有关部门得知，1976年10月6日执行拘捕江青的是张耀祠。张耀祠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曾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直至毛泽东去世。1964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10月，张耀祠首次披露了拘捕江青的真实详情，并给我看了有关这一情况的手稿。

张耀祠说，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他立即赶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刚刚奉命赶到。汪东兴对他俩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又说：“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同时还把拘捕毛远新的任务交给了他。武健华作为他的副手。决定在晚上8时半行动。

当他奉命前往中南海江青住处执行任务时，连手枪都没有带。和他一起执行任务的几个人，也没有带枪。我问他，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怎么不带枪？他笑道：“江青的卫士，全是我的部下，我用得着带枪吗？”

张耀祠跟江青的卫士点点头，就进入江青的住处。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看了一眼。张耀祠以严肃的口气，向江青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向江青所宣布的就这么几句话。他手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这几句话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所说的。在他宣布之后，江青并没有传说中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听到之后，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板着面孔。过了一会儿，她才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文件柜的钥匙，然后在保密信封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再装了钥匙，把信封密封，交给张耀祠。接着，张耀祠让江青坐上她自己的专车，由她的司机驾驶，武健华陪同，驶往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把她临时拘押在那里。

这一切，如张耀祠所说，没有什么戏剧性。当我把外界种种传闻告诉他时，他不由得大笑起来，说这些人的想象力真丰富！

#### ◇ 走访王洪文的“死对头”

耿金章，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连耿金章自己都未曾想到，他会一跃成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旗鼓相当。在安亭，他还不过是“工总司”中的普通一兵，而那时，王洪文已经做了“工总司”的司令了。当王洪文带领一批造反队员跟随张春桥回上海时，耿金章跟随那批坚持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走了。这是一支乱哄哄、由许多工厂的工人组成的队伍，是一帮乌合之众。后来耿金章把队伍拉到红都剧场，居然拉起一个新的山头，名曰“北上返沪第二兵团”，耿金章自任“二兵团”司令。

名义上，“二兵团”乃“工总司”的下属，但它的势力，曾一度比“总部”还大！耿金章与王洪文唱对台戏，闹了起来。王洪文要把耿金章从“工总司”中开除，散发《耿金章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的传单，开列了耿金章闹“分裂”的一系列“罪行”。

耿金章并非等闲之辈。1967年1月15日凌晨3时半，“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红三司”）等两三百人突袭康平路，夺走了上海市委大印。

后来，“二兵团”又突然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等“走资派”从“工总司”手中抢走。

一天午夜，上海大厦忽然出现了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一律蒙着大口罩。只是一点也没有造反派那副盛气凌人的派头。他们是经过“二兵团”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一下楼，他们便被押入停在门口的两辆大卡车里。

其中的一辆驶往徐家汇。车上坐着马天水。因为他已再三申明，希望与陈丕显、曹荻秋分开。直至后来马天水被张春桥“解放”，人们才明白他要求与陈丕显、曹荻秋分开的原因，“二兵团”把他秘密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

那辆载着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卡车，在上海市区转了几个圈，确信后面没有跟踪而来的“尾巴”之后，这才驶向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禽蛋五厂。陈丕显、曹荻秋在那里被秘密关押着。后来，又被转移到衡山饭店、新城饭店、国际饭店……

耿金章对王洪文说：“陈丕显、曹荻秋在我手里。你们要开批斗会，那就向我‘借’。批斗完了，马上‘还’给我！”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徐景贤、“工总司”的王洪文等，已在筹划着上海夺权。他们联合了38个造反派组织，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而耿金章则把被排斥于“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32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起来，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备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又一次唱起了对台戏！张春桥决不会无动于衷。他要求耿金章和王洪文商谈“二兵团”并入“工总司”的问题。王洪文对耿金章说：“2月25日上午8点，在国棉三十一厂谈判。”

那天上午，耿金章的轿车驶抵长阳路1382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在门口迎候的是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一伙人冲上去，抓住了耿金章。此时，耿金章才知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王洪文给杨浦公安分局打电话，把耿金章关在那里。“司令”被抓，“二兵团”也就土崩瓦解了。耿金章被关了两个多月，5月2日，王洪文忽然来杨浦分局“看望”耿金章，说是根据“中央首长”的意见，明日释放他。耿金章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便是张春桥。

翌日，耿金章果真获释，但是，他早就成了“空头司令”，“二兵团”已不复存在。

□ 摘自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 【研究评论】

文革七问  
• 卢周来 •

我想就文革提出以下七个问题请教于在座各位：

第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对于什么是历史，本世纪初的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但这几位史学家所说的历史都是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认识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是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话语表述，因而是主观的。但在历史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则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几位历史学家说这些话，决不是说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因为知识分子掌握著对历史认识的话语权利，所以要求知识分子在尊重历史本体、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本体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以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见证者与记载者的责任。

正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他说，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情感的强烈性与深刻性，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呢？”

为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 Barbara Tuchman 写过一本《实践中的历史》的书，书中有一节叫“历史从何时开始”，其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历史，必须具备与历史的疏离感。他说，历史学家既是同时代人，更是后代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后代历史学家的最大有利条件是他描述的事件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至少可以做到相对客观，有可能作出比同时代人更为正确的评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不利条件是缺乏超然的态度，无法对冲突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经写过一种当代中东史，写得很精彩，但最终他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就在于他认为，作为中东当代史亲历者，他的东西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记录。

近年来，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撰写回忆录，叙述自己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浩劫中的所遇、所思、所想，这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认识文革，再反思文革自有其意义。我尤其看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印红标先生声称的“历史考证”，因为这恰是对历史本体的钟情，而非先搬出历史认识；另一个是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但勿庸讳言的是，更多的个性化的回忆恰无法达到对“文化革命”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因为它们始终有几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首先是掺杂了个人太多的主观的东西。有一些回忆甚至都有相互矛盾之处，以至于还有人在回忆录中就一些细节问题“打笔仗”，由此降低了这些回忆具有的史料价值及其客观性；其次是情绪化突出。一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往往因不能摆脱过去痛苦而显得理智不足，不是把这场运动放在大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而满足于在回忆录中对曾“亏待”过自己的人与事大泄不满；再次是少数人回忆文革的目的值得人怀疑。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人似乎想摆出自己所受的苦难，或者说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巩固或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力”，提高他们的地位；最后一点，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但这些回忆录恰把事情做颠倒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文革；对于没有亲历文革或者受文革冲击不大的年轻一代关于文革的认识，则要么不理睬，要么怀疑对方的动机。最典型的一句话莫过于：“让这些家伙也经历文革，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在我看来，恰是这些年轻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因而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才能做到较为客观公正；恰是文革过来人，不具备这种历史的疏离感，纠缠于文革中个人经历其中，百千情结不能自解，以至于让种种如浓雾般业障、无明、烦恼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因此，我认为，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所以，我很同意邓小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他又说，文革作为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到底怎么看，相信后来人比我们看得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没有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我说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评价”，而在于“怎么评价”，毕竟，作为文革，那么一段切近的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会回首前尘，但到底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作不到“看透”的。

第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比如，我上文所指一些个性化很强的回忆录，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人们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是知识分子，除了知道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批判小组其实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根据文献可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对教育界的所谓“两个估计”以及提出知识分子“再教育”也是首先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第一批造反派出自于某大学，取消高考制度建议者还是某大学……也许有的知识分子会为知识分子开脱：我们“毕竟是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也就被迫这么做了。这种开脱是一种最典型的“制造”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集体无意识”中一部份，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同时，自古以来就“好为王者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是不甘心寂寞的，许多人是自觉地参与，从整人始到被整终，所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是双重的。由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要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刚才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又说应该是这个体制忏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文革这样的大灾难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在文革中忏悔。还有，我也不认为文革的责任可以无限上推到毛泽东一人，象在座有人说的，难道最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至于体制，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体制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体制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

第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致性？我不同意有人说的，表面上一致，实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其共通之处就在于利益两字。正如大家所说，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确证文化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利益具有合法性，必须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利益格局；但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承认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不过是从切身利益考量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并不是什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恰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第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在座有人说毛泽东是想利用文化革命巩固解决毛的独裁体制，是一个暴君角色。我只想提醒注意毛泽东的另一面。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70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至于在座的说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责任应该由毛泽东负。我想指出的是，毛本人的初衷是在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但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说到这里，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上，我想要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在这点上，我反倒又倾向于制度学派许多观点。制度学说认为制度是更基础的东西，而且宣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传统很重要，一是时间很重要”。理解毛的大众民主失败以及文化革命演变成血腥味的运动，包括追究责任，用制度学派的观点我看很有用。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可以开脱毛责任的理由，正如上文所说的不能成为开脱知识分子的理由一样。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以此开脱自己，却为何不彻底遵守形式逻辑，也以此来理解毛呢？

（王小东：赵紫阳也想用专制推进市场经济。听说严家其在海外说，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看来对了。）

有些认识，虽然非常不对，但这是现实。

（高粱：其实1993，1994年毛泽东热，和法轮功，说明一些问题。）

第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遍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刚才王东成先生也承认，在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中间，考上大学的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而在工厂当工人的却讲文化革命的好话；还说了到江西调查时，农民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反感。这其实还是个案，却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骂文化革命，而普通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与下岗职工，却都怀念文化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我也说些现象给大家听。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比如科技成就，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比如农村医疗保健，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培训留得住用得着的农村自己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中国当时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随著毛时代赤脚医生的老去反倒倒退到解放前；再比如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农村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从那时开始，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扫盲运动也早已名存实亡；还有水利设施，现在农村用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二十年随著集体资产的从有到无，这些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与规范而正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对比。因为老百姓也是从切身当下利益考量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第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反映在文化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晖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上说了这样的意思：九八大洪水最需要我们做点什么的时候，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欢欣鼓舞。余世存先生在给友人一封信中说：“洪水当前，万方多难。我们却象文化山上一群聪明人，吃着从奇肱国运来的粮食，能够专心研究学问。而这学问是怎样的学问啊。数理逻辑、几个名词、名人就让我们象找见情人一样目无他人，只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一个。我们的学者以能进入国际学术界为荣，我们的眼睛盯著国外的明星一样的学术大师，我们的青年学生以追星为时尚，我们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成为留美预科班为办学的本质和荣誉……在一些知识社会学者眼里，中国的学术界完全不同于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它独立于社会其他任何阶层……当知识分子只成自己的前卫和时髦时，它就完全退出了一个欲求发展的民族社会的前列。”

因为余世存先生的话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还想再引用上一段：“如今，我们的知识界以为自己是天生幽人独来独往。除数十年前梁漱溟先生为中国农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余世存的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

子为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关于权力的架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统治近五千年的国家，如何演化出一种现代性政治。

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毛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

□ 本文摘自“思想讨论会纪要”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